

新文学天穹两巨星 鲁迅与胡适

易竹贤 著

红烛学术丛书

RED CANDLE
ACADEMIC LIBRARY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红烛学术丛书

新文学天穹两巨星 ——鲁迅与胡适

易竹贤 著



RED CANDLE
ACADEMIC LIBRARY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全国优秀出版社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文学天穹两巨星:鲁迅与胡适/易竹贤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5. 4

(红烛学术丛书)

ISBN 7-307-04497-8

I. 新… II. 易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文学研究 ②胡适(1891~1962)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10 ②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3763 号

责任编辑:蔡先保

责任校对:王 建

版式设计:支 笛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wdp4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whu.edu.cn)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875 字数:310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307-04497-8/I·286 定价:23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所购教材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题 记

在新文学的天穹中,群星璀璨,光彩奕奕。鲁迅与胡适,便是这星群中最光耀、最醒目的两颗巨星。他们两人所发的光可以说各具独异的色彩,而对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起的开拓与奠基的作用,却都是巨大而且深远的,没有任何人能与之比拟或替代。

涉足学海至今已 50 年,主要讲授中国新文学史方面的课程。平生景仰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,亦颇钦慕胡适先生的学问文章,学术研究亦多所侧重,曾为两位巨人开设过专题课,也写过学习、评价他们的论文和著作,表达自己学习的心得及景仰与钦慕之忱。本书所收的便是这些论文和著作中的少部分,除了再度表达自己对两巨星的景仰和钦敬之外,尤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、学习与钦仰。

2005 年 2 月七十初度谨记

目 录

鲁迅对“国民性”问题的探讨	1
鲁迅与进化论、《天演论》	22
鲁迅世界观的转变	45
鲁迅的文艺思想概观	73
《阿 Q 正传》与反宗法专制的历史任务	123
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	
——鲁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	145
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中的胡适	153
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	180
胡适与“西化”思潮	199
从胡适婚姻家庭问题看转型期的新旧文化冲突	213
胡适散文的特色	231
胡适的小说考证	244
从《末代皇帝》看胡适的评价问题	277
“五四”时期鲁迅与胡适之比较研究	281
开拓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同路人	
——再论鲁迅与胡适	314
从鲁迅与胡适的足迹,看当代青年的人生追求	331

鲁迅对“国民性”问题的探讨

所谓“国民性”问题，是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；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曾聚讼纷纭，各种意见相距甚远，甚至相反，由此又影响到对鲁迅作品，特别是像对《阿Q正传》的理解。所以有必要严格按照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实际状况，对“国民性”问题作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，以祈取得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。

一、为求民族解放而探究“国民性”问题

“国民性”问题，并不是从鲁迅才开始提出的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潮的传入和中国民主主义的发展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，先后都提出过并相当重视国民性的问题。严复曾经提出“鼓民力”、“开民智”、“新民德”，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本。^①梁启超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后认为，必须“唤起国民之议论，振刷国民之精神”^②。孙中山组织同盟会，号召“国民革命”，说：“所谓国民革命者，一国之人皆有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之精神，即皆负革命之责任。”^③邹容更大声疾呼“拔出奴隶之根性，以进为中国之国民”^④。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，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，他们都需要动员全民族来参加自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，因而“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

① 严复：《原强》。

② 梁启超：《戊戌政变记》。

③ 孙中山：《同盟会宣言》。

④ 邹容：《革命军》。

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”，“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”^①，以动员和发挥国民的力量，去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所讲的“国民性”，通常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国民的精神状态，与民族性是一致的，或者是一回事。

民元以后，袁世凯窃国称帝，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。进步的和革命的知识分子，在救亡图强的斗争中，也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。陈独秀在他主编的《青年杂志》（后改称《新青年》）上撰文指出，长期的君主专制统治，“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”，乃是“亡国灭种之病根”^②，因此，他把改造国民性当作救亡的“拔本塞源之计”。他说：

今其国之危亡也，亡之者虽将为强敌独夫，而所以使之亡者，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。欲图根本之救亡，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，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，其量尤广，其势尤迫。^③

陈独秀的这种认识，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是有代表性的。《新青年》杂志曾经发表过像《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》（二卷六号）等一类解剖国民性和改造国民性的文章。

鲁迅正是在上述这样一种潮流下，提出研究国民性并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。据许寿裳先生回忆，早在留学日本时，鲁迅就开始注意探究国民性的问题了，他说：

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，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：

① 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费尔巴哈》，见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53页。

② 陈独秀：《抵抗力》，载《青年杂志》第1卷第3号。

③ 陈独秀：《我之爱国主义》，载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2号。

-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？
-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？
- 三 它的病根何在？^①

鲁迅一方面在探究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，一方面在追求着一种“最理想的人性”；他的探究国民性，正是为了达到那“最理想的人性”，也就是要从精神上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。事实上，他已经痛切地感觉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了。1906年，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，从日俄战争的电影画片中，看到了许多中国人围观一个被绑示众并将被日军砍头的同胞，因而深感国民精神的麻木，认为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^②于是，他毅然改变学医的理想，而从事文艺运动了。为着中国能“生存两间，角逐列国”，他大力主张“首在立人”，“尊个性而张精神”^③；他呼唤“精神界之战士”，去争取“国民精神之发扬”^④。鲁迅早期的这些行动和主张，目标之一，就是为着改造国民性，而一开始，他便是把这个改造国民性的问题，同中华民族的救亡与解放的道路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的。他后来还说到：

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，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。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，即纵有枪炮，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，倘敌手也有，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。这时候才见真强弱。^⑤

① 许寿裳：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，第19页。

② 鲁迅：《呐喊·自序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（出版者、出版年以后不再注出），第417页。

③ 鲁迅：《文化偏至论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57页。

④ 鲁迅：《摩罗诗力说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100、65页。

⑤ 鲁迅：《补白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100页。

鲁迅探究和改造国民性的着眼点在于自强。他在1936年3月4日给尤炳圻的信中,说得更明确。他说:“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,这是意在复兴,在改善……”由此可见,挽救危亡并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强盛,始终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探究与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。

二、鲁迅所提“国民性”的含义

鲁迅所讲的“国民性”,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呢?人们的理解至今很不一致。有的认为,鲁迅前期讲到国民性的缺点时,“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”,但他所攻击的主要是或“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”。有的则恰恰相反,认为鲁迅前期讲的“国民”和“国民性”,不仅没有缺乏阶级分析,而且“阶级内容是明确的”,是指不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等敌人在内的“人民大众”,指“人民大众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”。这种认识上的分歧,其实只要真正从鲁迅作品和思想的实际出发,实事求是,并不难解决。

在鲁迅著作中最早提到“国民”的是《斯巴达之魂》(1903年)。那里的“国民”一词,与“国人”同义,指全国的住民。后来,在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等文章中,仍沿袭这种用法。到了“五四”时期,鲁迅使用“国民”一词,大多数情况下仍是泛指,并无明确的阶级区分。如他曾把“节烈”认为是“多数国民”的意思。在“五四”以后的许多文章中,鲁迅也常用“国民”来泛指中国人,如:

……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,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,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,也还是卑怯的国民。^①

这里的“国民”即是指“中国人”,包括文中提到的反动军警、反动校长杨荫榆及她的一班狐群狗党,还有与他们对立的学生,也无

① 鲁迅:《忽然想到(七)》,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,第61页。

所谓“明确的阶级内容”。

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，对于国民多已经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了，而对于“国民”这个词，却仍然是在泛指的意义上来使用的。如他在分析谚语的阶级性时指出：

粗略的一想，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，但其实，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意思。现在就以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”来做例子罢，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，教人要奉公，纳税，输捐，安分，不可怠慢，不可不平，尤其是不要管闲事；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。^①

鲁迅对谚语进行了阶级分析，而“国民”一词也有了明确的阶级内容，包括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这对立的两个阶级的人们，词意却仍是泛指。由此可见鲁迅使用“国民”一词的连贯性，在一般情况下一直是泛指全国人；前后期的区别只在于前期对国民尚缺乏阶级分析，后期则有了阶级分析，而不在于“国民”所指的只是“人民大众”或“统治阶级”。

既然弄清了鲁迅使用“国民”一词的含义，那么他所讲的“国民性”的含义也就比较容易明白了。他最早在《摩罗诗力说》中使用了“国民性”这个词，凡二处：

裴伦平日，至不满于希腊今人，尝称之曰世袭之奴，曰自由苗裔之奴……希腊堕落之民，又诱之使窘裴伦。裴伦大愤，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；前所谓世袭之奴，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。

（普式庚）至与裴伦分道之因……或谓国民性之不同，当为是事之枢纽，西欧思想，绝异于俄，其去裴伦，实由天性，

① 鲁迅：《谚语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542页。

天性不合，则裴伦之长存自难矣。^①

前一段，拜伦批评希腊人“国民性之陋劣”，指的是“希腊今人”，自然包括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状态。后一段说普希金曾受拜伦影响，后来走向不同的道路，原因在于“国民性之不同”，实即“西欧”与“俄罗斯”民族性的不同。这两处，国民性即等于民族性，不涉及阶级的分野，也无从分出什么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。

到“五四”时期，鲁迅基本上还是把国民性当作民族性来看待的。他在《热风·随感录三十八》里说：“民族根性造成之后，无论好坏，改变都不容易的。”这里的“民族根性”实际上就是他所解剖的国民性。文章批评那种标榜所谓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国民，揭露他们盲目自大，宝爱“国粹”，自欺欺人，甚至以丑恶的行径骄人，而这种坏的民族根性导致的结果则是“复古，尊王，扶清灭洋”。批判的锋芒是向着宗法统治和复古主义者的，同时，却也把受统治阶级“昏乱思想”影响的落后民众一起包括进去批评了。鲁迅当时还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影响，因而笼统地称之为“不长进的民族”，笼统地批评所谓“民族根性”里“中国的昏乱病”，虽有很猛烈的反宗法专制的作用，却也反映出了他当时思想的局限。他在《〈医生〉译者附记》中又说：“人说，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，这很奇异，但让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。”这同样是说的民族性问题。还可以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。1925年“五卅”以后，有些人嘲笑爱国学生的运动只是“五分钟热度”，鲁迅据理予以驳斥，他在《华盖集·补白》一文中写道：学生们“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”，运动不能持久的责任不在他们，而在于民众的“谁也不动”，并进而指出：

这“五分热”是地方病，不是学生病。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，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；倘在别的有活力，有生气的国度

^① 鲁迅：《摩罗诗力说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80~81、88页。

里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。外人不足责，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，有权者，袖手旁观者，也都于事后来嘲笑，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！①

所谓“地方病”、“全国民的耻辱”，显然是包括着“灰冷的民众”、“有权者”、“袖手旁观者”各色人等，包括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，是相对于“外人”的本国的“全国民”的精神病状。鲁迅有时候还把国民性的弱点称为“华夏传统”，有时又称为“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”，都是作为民族性的弱点，或一个时期国民精神的弱点来揭露、来抨击的，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只是指“民众”，有着什么“明确的阶级内容”。

由上述鲁迅作品的实际情况，大致可以得出结论：鲁迅所提的“国民性”问题，一般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国民的精神状态的问题，也就是民族性的问题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他是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民众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来考察的。

三、鲁迅解剖刀下“国民性”弱点种种

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过程中，鲁迅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、劣点，“这些现象，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”；然而他又相信“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”②。因此，他决心“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”③，以引起疗救的注意。鲁迅解剖国民性，正是为着改造国民性。

鲁迅揭露和解剖国民性弱点的工作，主要是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来做的。他的小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，特别是《阿Q正传》，确是集中地“暴露国民的弱点”的一篇杰作。通过阿Q等许多概

① 鲁迅：《华盖集·补白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106页。

② 鲁迅：《〈出了象牙之塔〉后记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0卷，第244页。

③ 鲁迅：《通讯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26页。

括着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又个性鲜明、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，鲁迅把那些沉重地压在“老中国的儿女们”躯体上和心灵上的历史垃圾，把他们灵魂上的污垢和伤痕，具现在读者面前，让人们从中甚至也能见到自己及周围人们的影子。他的杂文则确像是“显微镜”，“也照秽水，也看脓汁，有时研究淋菌，有时解剖苍蝇”^①，把国民性的病状尽行发露，且痛下针砭，深中时弊，甚至让今天的中国人也还会时或感觉到脑门上被扎进热辣辣的一针。鲁迅一生孜孜不倦地发露和攻打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与病根，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：

其一是“瞒和骗”。鲁迅痛感中国人的不敢正视人生，“万事闭眼睛”；尤其对于人生的痛苦，社会的缺陷，没有正视的勇气，于是只好自欺欺人，这方法便是瞒和骗。在《论睁了眼看》一文中，鲁迅集中地攻击了这种弊端，指出：

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，用瞒和骗，造出奇妙的逃路来，而自以为正路。在这路上，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，懒惰，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满足着，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，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。^②

鲁迅敏锐地看到并揭露了“瞒和骗”的病根，在于历代统治阶级的“圣人”和“古训”，在于孔孟儒家的反动思想统制。由于这种反动思想的严酷统治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弯腰曲背、低眉顺眼的“老成的子弟，驯良的百姓”。他们不敢正视现实，只好用瞒和骗来掩盖社会的矛盾，粉饰生活的缺陷，“于是无问题，无缺陷，无不平，也就无解决，无改革，无反抗”，使社会永远停滞在一潭死水之中。

由瞒和骗又产生出一种“瞒和骗的文艺”，“由这文艺，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”。鲁迅曾一再揭露这种瞒和骗

① 鲁迅：《做“杂文”也不易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，第376页。

② 鲁迅：《论睁了眼看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240页。

的文艺的虚妄和恶劣影响，指出其典型表现是中国旧文学中的“团圆”迷信。他说，历代才子佳人小说的“才子及第，奉旨成婚”，《红楼梦》续作的必令“生旦当场团圆”，等等，都是“自欺欺人”、“闭眼胡说”。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里，鲁迅又明确指出这种“团圆”迷信乃是国民性的一种表现。他总结文学史上根据唐人元稹的小说《莺莺传》改编创作的许多戏曲，如董解元的《弦索西厢》、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、关汉卿的《续西厢记》、李日华的《南西厢记》等，都改变了原作的结局，使张生和莺莺后来终于团圆了。鲁迅说：

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，是很喜欢团圆的，所以必至于如此，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，中国人也很知道，但不愿意说出来；因为一说出来，就要发生“怎样补救这缺点”的问题，或者免不了要烦闷，要改良，事情就麻烦了。……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，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；没有报应的，给他报应，互相欺骗。——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。^①

虽然，鲁迅认为“团圆”迷信是由中国人的国民性所决定的，认识上有片面性；他对于古今中国人“瞒和骗”的弊病及“瞒和骗的文艺”的尖锐抨击，却是击中要害，发人深思的。这许多年来，我们中国人吃这个“瞒和骗”的苦头，吃得还少吗？

其二是做戏。同“瞒和骗”相联系，鲁迅认为中国人还有一种“做戏”的毛病。他在《马上支日记》中，曾引述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（Smith）所著《支那人气质》一书里的话，以为“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”，装模作样，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，因而认为“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，便是这‘体面’”。鲁迅接着评论说：

^①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9卷，第316页。

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，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。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，是“戏场小天地，天地大戏场”。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，有谁认真的，就是蠢物。

他还把“中国的一些人，至少是上等人”，称为“做戏的虚无党”或“体面的虚无党”。他的矛头当然主要是指向“上等人”，但也包括其他的“中国的一些人”，可见鲁迅也是把“体面”与“做戏”当作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来揭露的。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，在《新的“女将”》和《宣传与做戏》等文章中，虽然也主要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不抵抗主义，即“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”的把戏，但对那些“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，然而看得更起劲了”的读者和看客，鲁迅也是深为不满的，同样认为他们存在着“做戏”或“喜欢玩把戏”的毛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写于后期的这两篇文章，也引述了旧时戏台上的那副对联：“戏场小天地，天地大戏场”，用它来作为中国人喜欢做戏的概括表现，可见鲁迅对此一直怀着深沉的忧愤。他是精通中国历史的，深深懂得我们已经被这“做戏”耽误了多少个世纪，怎么能够容忍一些人仍然把整个中国当作一个大戏场呢？只有结束了这“做戏”的日子，中国才会有希望。

其三是“看客”式的无聊。鲁迅最先感到中国国民精神的厚重麻木，如前所述，是在电影中看到那些“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，即“看客”。他深感中国人不仅把万事当作一出戏，而自己又“永远是戏剧的看客”^①。他们不能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，甚至也忘记了自己的痛苦，而对人生抱着“袖手旁观”的态度，精神上表现出极度的空虚和无聊。鲁迅曾经多次沉痛地描述过国民的这一病态：北京的羊肉铺子前，一些人“张着嘴看剥羊，仿佛颇愉快”^②；广漠的旷野之上，一男一女持刀对立，于是“路人从四

① 鲁迅：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163页。

② 鲁迅：《娜拉走后怎样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163页。

面奔来，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”，来赏鉴他们拥抱或杀戮。^①鲁迅后来说，他创作《复仇》的动机，就是“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”^②。这其实是他一贯的思想。小说《示众》也是一篇集中地揭露这种“旁观者”、“无聊人”的作品，而且同样突出写到人们“嘴都张得很大，象一条死鲈鱼”的麻木神态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鲁迅仍没有忘记对这种病态的针砭——

旧历端午，在一家戏场里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，就又是推，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。死尸摆在空地上，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，人山人海，又是推。

推了的结果，是嘻开嘴巴，说道：“阿唷，好白相来希呀！”^③

这篇文章原是揭露“洋大人”及“高等华人”践踏“下等华人”的罪行，而对于“人山人海”“嘻开嘴巴”去当看客的市民们，鲁迅同样是愤慨而憎恶的。

其四是卑怯与势利。鲁迅以他独具的慧眼发现，中国人由于“受强者的蹂躏”，蕴蓄着许多“怨愤”，“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，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”，这便是“卑怯”^④。他曾经用非常形象的比喻，揭露国民性的这种卑怯的特点：“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”^⑤。卑怯事实上常常是同势利紧密相联的，“遇见强者，不敢反抗”，并且趋炎附势，现出奴颜婢膝的丑态，而对于弱者，则“多是凶残横恣，宛然一个暴君”^⑥。鲁迅指出，正因为国民性的这种卑怯与势利，所以——

① 鲁迅：《野草·复仇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，第172页。

② 鲁迅：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，第356页。

③ 鲁迅：《推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，第196页。

④ 鲁迅：《杂忆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225页。

⑤ 鲁迅：《忽然想到（七）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61页。

⑥ 鲁迅：《通讯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26页。

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，少有韧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，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；见胜兆则纷纷聚集，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^①

多么深刻的揭露和解剖！历史上人们是那样见强者即蜂聚拥戴，遇挫败则“纷纷作鸟兽散”，甚至于墙倒众人推。在这面历史的镜字面前，一些人不会同样感到毛骨悚然吗？

其五是自利而不惜破毁公物。鲁迅把中国人的这一毛病，沉痛地称为“奴才式的破坏”。他由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倒掉这件事，指出这种破坏不同于“改革者的志在扫除”，也不同于“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”，其特点是——

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，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。人数既多，创伤自然极大，而倒败之后，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。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，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。共有的塔失去了，乡下人的所得，却不过一块砖，这砖，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，终究至于灭尽。^②

这确是普遍存在于一些中国人身上的弱点。鲁迅还举出了几件类似的事实，证明了这种普遍性：龙门的石佛，大半肢体不全；图书馆中的书籍，插图须谨防撕去；凡是公物或无主的东西，倘难于移动，能够完全的却不多。这种奴才式的破坏，在中国实在太普遍了，老百姓如此，统治阶级更是如此。鲁迅曾经揭露说：“中国公共的东西，实在不容易保存。如果当局者是外行，他便将东西糟完，倘是内行，他便将东西偷完。”^③而且，他们岂止于盗窃公共的图书古董等财物而已，鲁迅愤慨地指出：“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，现在正不知有多少！”鲁迅一方面深刻地批判了这

① 鲁迅：《这个与那个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142页。

② 鲁迅：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第194页。

③ 鲁迅：《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》，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第567页。